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潜夫论校注

古典名著标准读本

原著 • [东汉] 王符

校注 • 张觉

QIANFULUN
JIAOZHU



《潜夫论》是一部东汉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经世济国、文治武功、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本书对原作作了精辟的题解以及详细的注释，融文学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是文史爱好者值得品味的经典之作。



岳麓书社

出

版

GU DIAN MING ZHU

BIAO ZHUN

DU BEN

潜夫论校注

古典名著标准读本



原著 ◇ [东汉] 王 符

校注 ◇ 张 觉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夫论校注/(汉)王符著. 张觉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 - 7 - 80665 - 993 - 9

I. 潜...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东汉时代②政论—中国—东汉时代③潜夫论—注释

IV. B234. 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055 号

潜夫论校注

作 者:张 觉 等

责任编辑:曾德明 喻美灵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22. 5

字数:56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 - 7 - 80665 - 993 - 9/G · 627

定价:35. 00 元

承印: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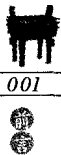
电话:0731—8884129

前言

东汉王符以区区布衣而成为享誉古今的思想家、政论家，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主要在于他所著的《潜夫论》博见卓识，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该书不但对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化等各个方面作了真实的揭示与深刻的批判，而且对政治策略、文教德化、经济方针、边防建设、人才选用、修学立身、交际处世、宇宙本原、人类起源、远古帝系、姓氏源流、上古制度、卜筮祝咒、看相占梦等等都作了颇有价值的探讨与剖析。应该说，《潜夫论》不但是一面真实地反映东汉社会的镜子，而且是一座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学术宝库。所以，它不但是研究东汉时代的学者所必须关注的一部要籍，而且是每一个想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所必须阅读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一、王符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处的时代

古代关于王符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有限，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他的原始材料，除《潜夫论》中的一部分内容外，只有《后汉书》卷四十九的《王符传》。根据这些材料，可知王符字节信，东汉安定郡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人。虽然他因为庶出而受到乡里之人的鄙视，但他从小就很有志气，勤奋好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有节操的著名学者都有友好的交往。



从他所写的文章来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孝经》、《左传》、《孟子》等等,而且也通晓诸子百家及各种史籍,如《老子》、《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国语》、《周书》、《世本》、《战国策》、《史记》等等,甚至还精通各种方术杂占之书,并能将各家著作融会贯通且结合社会实际而形成一家之言。应该说,他既是一个博学多识的鸿儒,同时也是一个对社会现实具有清醒认识的思想家。但由于东汉和帝、安帝以后官场日益腐败,仕进得依靠奉承巴结当权者,而王符秉性正直,偏偏不同于流俗,不会随风转舵、奉承拍马,所以他即使才高学深,也一直没有做上官而闲居在家。对此,他是很愤慨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使自己不朽于世,他便在不能立德、立功的境遇下发愤著书,写了很多指责时弊、研讨学术的文章。他自号“潜夫”,将其著作定名为《潜夫论》,以此来表示他对世俗社会的不满以及与黑暗官场的彻底决裂^①。不过,他虽然终生未仕,但他的高风亮节及其学术造诣早已使他颇有名望。皇甫规免官回安定后,同乡中有个曾靠贿赂得任雁门太守的去求见他,他躺着不去迎接,一会儿听说王符在门口,他便匆忙起床去迎接,携手进屋,促膝相叙,极为高兴。此事一方面表现出皇甫规对名节之士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王符在当时的名望。

至于王符的生卒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人们只能根据《后汉书》的有关材料作一些间接的推测。现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王符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公元162年^②。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如有人认为他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公元163年^③,有人认为他约生于和、安之际而卒于桓、灵



之际^④，有人认为他约生于公元108年而卒于公元174年^⑤，还有人认为他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而卒于桓帝、灵帝之际（公元167年左右）^⑥。究竟哪一种说法较为合乎实际呢？

《后汉书·王符传》说：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据《后汉书·马融列传》，马融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则其生卒年为公元79年至166年。据《后汉书·张衡列传》，张衡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则其生卒年为公元78年至139年。据《后汉书·崔骃列传》，汉顺帝汉安初，大司农胡广曾推荐崔瑗任济北相，岁馀，病卒，年六十六，则其生卒年当为公元78年至143年。据《后汉书·窦融列传》，窦章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卒于家，其生年则无从推知。从马融、张衡、崔瑗的生年仅差一岁的情况来看，青少年时互相友善的人，其年龄是很接近的，这也合乎我们现在的情况。依这种人之常情推测，则王符、窦章也当生于公元78年或79年。所以，没有其他佐证而说王符生于公元85年，虽然还不能贸然断言其误，但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至于认为他生于和、安之际（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则显然是未详考《潜夫论》而导致的误说。因为据《潜夫论》本文，可知《劝将》作于公元111年，《救边》作于公元115年，《边议》、《实边》作于公元116年^⑦，这些文章显然不是一个儿童所能写成的。

至于说王符生于建初七年（公元82年），其理由是：据古书上的古注，“符”有符瑞、瑞应的意思；王符字节信，而《周礼·春官》注云：“瑞，节信也。”这注解正可证明王符的“符”

是符瑞的意思。另一方面,章帝建初七年,岐山出现了铜罇、白鹿等符瑞,王符取名“符”,很可能与此有关。所以,他应该出生于建初七年^⑧。这种说法似乎有理有据,但我认为它是出于一种误解。因为王符的“符”并非是符瑞的意思。从《潜夫论》之文来看,《思贤》“稽节合符”、《本政》“千里合符”、《三式》“剖符受策”、《交际》“掩若同符”等等,“符”均是符节、信符的意思。至于符瑞,《潜夫论》中往往说成“祥”(见《务本》)、“符瑞”、“瑞应”(见《三式》)、“应瑞”(见《巫列》)、“休徵”(见《相列》)、“珍异”(见《本训》)等等,而单言“符”者极少。由此可见,“符”在古代虽然有时用来表示符瑞,但王符之“符”应该是符节、信符的意思。至于《周礼·春官·序官》“典瑞”注云:“瑞,节信也。”其实也不能证成其说。因为说“节信”之“瑞”是指瑞玉,即玉制的信物,所以《周礼·春官·典瑞》注云:“瑞,符信也。”可见,王符字“节信”,正好可以用来证明其“符”字是符节、信符的意思,而根本不能用来证明其“符”字为符瑞之意。诚然,即使王符之“符”为符瑞之义,但章帝时的符瑞也并非只出现在建初七年。据《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而《礼记·仲尼燕居》“万物服体”《释文》云:“符,谓甘露醴泉之属。”据此,我们似乎也可说他因降甘露之符瑞而取名,从而证明他生于公元79年。

《后汉书·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后王符曾去拜访他。《四库全书·潜夫论·提要》说:“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所以现在的学者大都将王符卒年定在公元162年(即延熹五年)。然而,据《后汉书·皇甫规传》,皇甫



规为安定朝那人,延熹四年冬,他被举为中郎将,破零吾;明年冬,征还拜议郎,遭徐璜等陷害而下狱;会赦,归家。据《后汉书·孝桓帝纪》,延熹四年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破羌;延熹六年三月,大赦天下。由此可知,皇甫规解官归安定应在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三月以后。既然他回安定后王符去拜访过他,则王符至少应该活到公元163年4月,而不可能死于公元162年。至于他究竟死在哪一年,则因为没有确实的材料而难下定论。

总上所述,我认为王符的生卒年大致与马融相似,即:约生于公元79年(或78年),卒于公元163年夏季以后,可能卒于公元165年。他的成人活动期是在东汉和帝至桓帝之时^⑨。

这一时期,是东汉王朝日益衰落的时期。公元88年和帝即位时才10岁,由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后来和帝与宦官收窦宪大将军印绶,又迫使其自杀^⑩。公元105年和帝死,殇帝即位时才生下百馀日,由邓太后临朝^⑪,太后兄邓鹭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⑫。公元106年殇帝死,安帝即位时才13岁,仍由邓太后临朝^⑬。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安帝亲政,便铲除诸邓^⑭,诸宦官及安帝乳母王圣母女用事,狼狈为奸,作恶多端^⑮,气势凌人。如王圣之女伯荣奉使出外,王、侯都得拜于车下,所到之处,便得修路供物,花费甚巨^⑯。宦官如樊丰等也与王圣一样,肆无忌惮,诈作诏书,调发钱谷、木材、徒士,各自建造家舍、园池等,役费无数^⑰。公元125年安帝死,阎后立北乡侯而自己临朝,以阎显为车骑将军^⑱。当年北乡侯死,宦官孙程等立顺帝,杀阎显,幽禁阎太后,当时顺帝才11

岁^①，大权实为宦官所掌。宦官权势日重，不但被封侯，而且得以养子袭爵。后来梁氏渐渐得势，公元144年，顺帝死，冲帝即位才2岁，梁太后临朝^②。次年冲帝死，质帝即位才8岁，大将军梁冀更为骄横，质帝称他为“跋扈将军”，结果便被梁冀毒死了^③。公元146年，桓帝即位时才15岁，仍由梁太后临朝^④，梁冀更为横行跋扈。他妻略妇女，乱杀无辜；对街起宅，台阁周通；广拓园林，起菟苑数十里，伤其兔者罪至死^⑤。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定谋铲除梁冀^⑥，以后权势便又落入宦官手中。由此可见，这时期的皇帝即位时都年幼，不能理事，而外戚、宦官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所以朝中大臣往往不能正常地行使职权，因而导致了政局的混乱。而在朝得势的外戚或宦官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也助长了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顺帝时命杜乔、张纲等八人巡视州郡，查究吏治，张纲说：“豺狼当路，安问狐狸！”^⑦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官场之腐败。官逼则民反，所以起兵反抗者不绝。如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南郡巫县（今四川巫山县北）许圣等以收税不公聚众反叛^⑧。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金城、陇西诸郡羌人因徭役繁重、被派遣远征西域而起兵反抗，滇零等还自称“天子”，势力甚强，以致汉王朝只得将陇西、安定等郡内迁以避其祸^⑨；元初五年（公元118年），越巂夷封离等因赋敛繁多而反叛；次年，永昌、益州、蜀郡之夷皆反叛而响应封离^⑩。顺帝永建七年（公元132年），扬州章何等称将军，攻略范围涉及49县^⑪；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陵郡之蛮也因增加租赋而反叛^⑫；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九江郡蔡伯流攻至广陵，杀江都长；此后扬州、徐州等地起义不断，如张婴、范容、周



生、徐凤、马勉、黄虎等声势均大^⑧。桓帝时则有陈留人李坚起兵；而泰山、琅邪一带起义军公孙举等攻及青州、兖州、徐州，规模更大；其后泰山郡劳丙、叔孙无忌等又相继起事；长沙郡、零陵郡的起义军也攻占桂阳、苍梧、南海等地^⑨。东汉王朝就这样在朝野动乱中日益衰微了。

追求建立“当世”“大功”而满怀激情、思想深刻的王符面对这种衰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中心时有感”。然而，由于他未能“当官”而“无所效其勋”，所以他就效法古代圣贤，总结历史教训，针对时弊，研讨学术，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愤懑熔铸成了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以寄托他的“愚情”^⑩。王符的“愚情”，实是一番救国救民的苦心与痴情。他在《潜夫论》中对种种社会弊端的分析与批判，无非是想拯救这衰微的时势、为民造福。当然，我们阅读《潜夫论》，总会感觉到字里行间缺乏一种雄壮勃发之气而充满着沉闷抑郁之情，这显然是当时社会日益衰败的情势在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不能苛责于王符的。虽然史籍未详载王符在当时的活动情况，但可以设想，在东汉王朝的衰败中，在陇西诸郡的羌乱中，在安定郡的两次迁徙中^⑪，王符必定倍遭衰世流离之苦。他特地写了《劝将》、《实边》等主张击羌救边的专论，更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时势对他的影响。

总之，我们在阅读其文章之前，只有首先知其人、明其世，才能更真切更透彻地领会文中的无限深意与殷殷深情。

二、《潜夫论》的写作、编定及流传情况

《潜夫论》一书的写作时间较难确定。

有人认为该书写于东汉桓帝之时^⑤，恐不当。因为：（一）桓帝即位在公元146年，那时王符已近古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抱负而不得志、有政见想“立言”以供当世“咨询”的有识之士^⑥，会在壮年志高才盛之时沉默不言，而到晚年精力衰竭之时才将其见识发诸笔端，写出这些颇具激情的文章来。（二）书中可以考见其写作时间的诸篇大都作于安帝之时或顺帝之时^⑦，则其他的篇章恐怕也不会写成于桓帝之时。据此，我认为《潜夫论》当作于安帝至顺帝之时，是他壮年时的作品，而非其晚年所作。

另外，从《潜夫论·叙录》所说的“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来看，全书的文章肯定是断断续续写成的，是经历了相当一些年头的。有人认为，该书始撰于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左右而成于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⑧。这种说法恐也不当。因为：（一）《劝将》作于公元111年^⑨，可见元初二年之前王符早已开始写作了。（二）永建四年王符才五十周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想“立言”以不朽于世的学者会在精力尚盛、笔力尚健之时洗笔而休；而从《叙录》“今又丘荒”一语来看，其《叙录》很可能写于公元141年以后^⑩。所以，我认为该书的三十五篇正文可能写成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之间，是他29岁到63岁之间的作品。

《潜夫论》最后一篇《叙录》是对全书的介绍，由此可以推见，《潜夫论》一书是王符亲自编定的。至于其编定的时间，当在公元141年以后^⑪。

《潜夫论》编定之后，可能即有抄本流传，所以皇甫规才



会“素闻符名”^④。

南朝宋代范晔所撰《后汉书·王符传》节录了《潜夫论》之《贵忠篇》（今本作《忠贵》）、《浮侈篇》、《实贡篇》、《爱日篇》、《述赦篇》的一些片段，但已经过删改润色，很多文字与今之传本不同，恐非王著之原貌。

《隋书·经籍志三》、《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均在儒家类著录了王符撰《潜夫论》十卷；而唐代撰辑的《意林》、《群书治要》所引《潜夫论》之文有些不见于明、清诸本，《群书治要》所引《德化》篇文字也无他篇文字窜入。由此可以想见，隋、唐时该书较为完好，尚无窜乱。

《郡斋读书志·子部·儒家类》、《宋史·艺文志四》均著录《潜夫论》十卷，可见该书在宋代也有流传，但宋版《潜夫论》现已不传。从现存的宋版翻刻本的影抄本来看，《潜夫论》在宋代已有脱误与错乱。然从宋代的类书《太平御览》的引文来看，有些误字显然在宋代尚未讹误。

清代嘉庆年间，汪继培曾看到过元代大德年间的刊本^⑤，可惜元刻本今已不传^⑥。幸好汪继培为《潜夫论》作笺时将它作为底本，所以我们还可以从《潜夫论笺》中间接地了解到它的大致面貌^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刻本的错乱大体与明刻本相同，可知它出自宋本而承袭了宋本的错误。

现传最早的《潜夫论》版本是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黄丕烈所跋的明刻本《潜夫论》十卷，据黄丕烈的跋^⑧，可知这是现存最早的《潜夫论》刻本，冯舒叫人影抄的写本即出于此。据冯舒的跋^⑨，可知其影抄本的底本为宋版翻刻本。由此推知，这种明刻本是一种仿宋刻本，值得珍视。可惜的是，

笔者现在限于条件,未能利用该本^④。

除上述这种明刻本外,明代还有一些刻本均被人们视为善本。

一是胡维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辑刊的《两京遗编》本^⑤。该本脱去了冯舒影抄本的卷五第十五叶,其卷六、卷七、卷八的文字也有错乱,而其错乱的文字起讫与冯舒影抄本之叶相合。由此可以推知,它是根据一本有错乱脱叶的明刻仿宋本翻刻而成的。由于它没有仿照仿宋本的版式刊刻,所以这些错乱使原文更为混乱难读。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两京遗编》^⑥,所以该本不难看到。

二是程荣于万历年间校刊的《汉魏丛书》本,该本每卷均标明“明 新安程荣校”,故习称程荣本^⑦。据说《汉魏丛书》原为何鏊所辑,但未刊行,至程荣才刊行了一部分。《汉魏丛书》的序是屠隆于万历壬辰(公元1592年)写的,所以现在有人认为该书刊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⑧。但《明史·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了“屠隆《汉魏丛书》六十卷”,程荣刊本当即源于屠氏辑本,故载其序,则其校刊年代,可能要稍后于屠序之时。程荣本有很多误字与冯舒影抄本一致,可知该本也出自明代仿宋刻本,但其版式已完全不同了。192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了程荣校刊的《汉魏丛书》,所以该本也不难看到。1992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汉魏丛书》影印本的缩印本,也可利用。

三是何允中于万历年间所刊的《广汉魏丛书》本^⑨。该本版式与程荣本大体一致,不同的只是删去了程荣本中每卷卷首“汉 安定王符著”、“明 新安程荣校”两行字,所以每页



均前移两行而已。该本文字与程荣本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该本出于程荣本,所刊年代当在其后。有人认为刊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④,恐不当。此外,有人将该本当作为“何鏜本”^⑤;后人未审,也往往承袭其说^⑥,实误^⑦。

明代除全本外,还有些选本。如陈深万历辛卯(公元1591年)辑刊的《诸子品节》卷四十七节录了《贤难》、《贵忠》^⑧、《实贡》、《爱日》、《述赦》、《交际》、《明忠》等七篇的片段。文震孟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参订刊行的归有光所辑《诸子汇函》卷二十二节录了《实贡》、《贵忠》^⑨、《爱日》、《述赦》、《明忠》等五篇的片段,还将《潜夫论》改题为《回中子》^⑩。这些选本的文字虽大都出入于明刻本与《后汉书》引文之间,但也有独特之处。

值得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有一种刻书年月不详的《潜夫论》刻本。该本卷一下标明:“汉安定王符著 都昌邵孟遴校”,其版式与何允中本相同而与程荣本不同,可知其出于何本。但该本比何本刊刻精良,且加了句读。从文字来看,也与何本有很多不同。这种刻本,后来被王谟取作为底本而刻入《增订汉魏丛书》,所以它当刻于明代万历与清代乾隆之间。

明末清初,明刻仿宋本已不多见。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在戊子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六月得到沈与文所藏的这种明代宋板翻刻本,便视为珍本,叫人印抄了一部^⑪。该抄本后为钱曾(字遵王)述古堂所藏^⑫,钱氏跋此书云:“此乃印抄宋本者,冯己苍详识于其末,校对亦精,须珍之。”其实,冯舒明明说其印抄的是“宋板翻刻本”,钱氏却说成“印抄宋本”,殊失谨严。而1919年上海涵芬楼辑印《四部丛刊》影印

此抄本时竟识云：“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述古堂景宋写本印行。^③”不但承袭了钱氏的误说，而且还容易使人误解为此本乃述古堂所影抄。于是，后人便往往称之为“影宋写本”、“述古堂本”、“影宋钞本”而认为它是“现存最早之本”^④。此种传说，实当澄清。当然，该本虽非影抄自宋刻本，而是影抄自宋板翻刻本，但还是较好地保留了宋本的面貌，值得珍视。而涵芬楼的影印，又大大地便利了人们的使用，可谓功德无量。商务印书馆又于1936年出版了《四部丛刊》缩印本，《潜夫论》在缩印过程中又产生了个别误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又影印了这种缩印本^⑤。所以这种本子现在很易见到。

《潜夫论》在清代流传日广，除冯舒影抄本外，可考见的还有以下几种。

一是乾隆甲戌（公元1754年）镇原周泰元等据《汉魏丛书》本重刊的本子^⑥。

二是于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所辑的《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该本为钞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台北世界书局于1986—1988年影印了《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所以该本不再是孤本了。

三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敕辑的《四库全书》写本。其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抄校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该本虽为孤本，但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90年缩印了它，所以此本现在甚易见到。该本显然有许多臆改之处。当然，其中有些文字虽与程荣本、冯舒本不同，却与《诸子品节》



本等相同,且与后来的王谟本、湖海楼刊汪笺本相合,可见该本也颇费了一番校勘工夫,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是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王谟辑刊的《增订汉魏丛书》本,王谟还撰有一篇《潜夫论》跋^⑥。该本卷一下标明:“汉 安定王符著 都昌邵孟遴校。”诚然,其校并非出于邵氏之手,而不过是以邵校本为底本罢了,故其版式、文字基本上与邵校本一致,但也有差异。该书后来又有一些翻刻本,如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三余堂刊本,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等。不过,有些翻刻修补本又兼取何允中本为底本,所以其文字与王谟本并不一致。

五是陈春辑刊的《湖海楼丛书》中的《潜夫论汪氏笺》。该书书首题明“嘉庆丁丑仲夏”“萧山湖海楼陈氏雕版”,所以有人认为它刊于嘉庆二十二年(即丁丑年,公元1817年)^⑦。但是,其中所刊王绍兰序却作于嘉庆己卯(公元1819年)秋,可见该本虽开雕于1817年,实刊成于1819年之后。该本是《潜夫论》十卷的第一个笺注本^⑧,其笺注极其精博,虽不免有所失误,但至今尚未有其他的注本能与之媲美,所以成了本世纪最通行的《潜夫论》读本,不断被翻刻重刊。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国学整理社所编的《诸子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本,均取此笺本重排而成;而北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上海书店等都重印过《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也出版过《潜夫论》汪笺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还于1979年、1985年出版了彭铎校正的《潜夫论笺》(1985

年版名《潜夫论笺校正》)。其流布之广可以想见。

六是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所刊的《子书百家》本。与其他明清刻本相比,此本无善可陈。

清亡以来,《潜夫论》的流传极广。其版本大致有两类:一是影印明、清善本,如《两京遗编》本、《汉魏丛书》本、冯舒影抄本、《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都有影印本问世(见上文)。二是重刊本,如1914年上海扫叶山房所刊的石印本《百子全书》(此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影印过),即是《子书百家》的重刊本;再如湖海楼所刊汪笺本,重刊者就更多了(见上文)。

《潜夫论》的流传虽越来越广,但对该书的校注诠释,却相对薄弱。自汪继培吸收卢文弨、王宗炎、孙志祖、王绍兰之说并作了全面的校笺后,近二百年来还未有新的汇校注释本问世。校释该书较著者只有俞樾的《读潜夫论》一卷^①,孙诒让《札迻》卷八的三条札记,以及彭铎的校正^②。这些校释,都只是对汪笺的零星补正,而其说虽有发明之处,但成就显然不能与汪笺相比。此外,对《潜夫论》作全面诠释的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评析本白话盐铁论·潜夫论》^③,以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王符〈潜夫论〉译注》。总之,当今《潜夫论》的校注诠释工作相对于该书的历史地位及文化价值而言,显然是远远地落后了。以往的学者,特别是汪继培,虽然解决了该书不少疑难,但要正确地读通全书,仅依靠他们的注显然是不行的。今人之所以有很多误译,原因即在于此。所以,该书的校注,还得花很大的力气。